

聚焦于“现代性”与“人文关怀”的阐释

——近年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对鲁迅的接受

孙 霞 陈国恩

内容提要 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同根同源,新加坡独立后的中学华语教材多采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进入 21 世纪后,新加坡中学华语教材里的鲁迅作品无论篇目还是解释都有变化,主要是“去革命性”,张扬“现代性”与“人文关怀”。这反映了鲁迅的经典性,也体现了文化传播的在地性与世界多元性的要求。新加坡的做法,有助于我们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文化景观,考察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规律。

关键词 新加坡;华语教学;鲁迅作品;现代性;人文关怀

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大多保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印记,但这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单方面承继。事实上,海外华人社区的中国文化因素往往是其所在国文化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占据多数的新加坡社会与中华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又必须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这种复杂的情形存在于新加坡社会的许多方面,其在华人的教学、特别是华人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映。要中学生学习华文,离不开中国文学作品。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张名片,受到重点关注,但这种借鉴是服务于新加坡的国家观念建设目标的,必然地对鲁迅有所取舍,并进行恰当的解释。深入了解新加坡中学华语教材对鲁迅作品的筛选及其依据,研究他们的阐释特点,在当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接受语境

作家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受制于多种因

素。这些因素中,文学作品自身的经典性及其承载文化意蕴的丰富性占据重要地位,但更不能无视接受国的接受语境。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国家,华人大约占 74.3%^①。新加坡在独立之初到上世纪末,一直面临着国家主体性与华人占多数这一事实的挑战。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对于国家语言做出了选择。自新加坡建国以来,华语连同英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共同成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新加坡实行双语政策,英语为第一语文,包括华语在内的其他三种语言为第二语文。因为新加坡人认为:“(英语)能让我们的学生更好地与全世界接轨。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英语的使用也为我国创造了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环境”^②。上世纪 80 年代,新加坡关闭了最后一所以华文为第一语文的华校。2004 年后的大学升学考试,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分数也不再计入总分。在这些政策影响下,近年来以华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华人逐渐

进入了中老年阶段,新加坡年轻人更多地使用英语进行交流,新加坡使用华语的家庭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修读华文文学的学生人数也相应减少^③。虽然如此,作为新加坡教育基石的双语政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会改变。新加坡政府^④,以及教育界有识之士^⑤,为逐渐衰退的双语处境而忧虑,不断调整政策策略,辅以相应的鼓励措施以提升新加坡国民华语水平。新加坡政府鼓励华语家庭及社区等做好母语的推广工作,鼓励采取以在家说母语等方式提高孩子的母语水平,华语仍作为华人族群应该掌握的第二语言。随着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新加坡政府试图“搭上中国这列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格外重视华语推广工作^⑥。在新加坡地铁站、公交站以及商场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中文标识语。新加坡电影院所播放的电影字幕通常也采用英汉两种语言。不可否认,华语仍然是新加坡的重要交际语言。

这一现实,影响了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学^⑦的方针。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学依据华文功能的不同,分为讲究实用工具性的华文课程以及满足提升文学鉴赏、加强华族文化认识的华文文学课程。为更直观地展示,笔者就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的情况制成表1。从

表1可见,就注重语言交际工具性的初中阶段的“中学华文”课程(新加坡课本称该阶段华文为“中学华文”)而言,根据从易到难的程度,依次分为华文(基础)、华文B、华文(普通学术)、华文(华文快捷)以及华文(高级)五个等级。四至五年制初中学习结束后再次进行分流,学生进入大学预科或初级学院等。这一阶段有与初中华文课程相衔接的“H1 华文”与“华文‘B’”课程(其中 H1 华文课程比华文‘B’课程难度相对要大),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使华文成为生活用语。此阶段还有“H2/H3 华文与文学”课程,该课程与初中的“中学华文文学”课程相衔接,注重进一步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与文学鉴赏水平。总体来说,华文文学课程相对同阶段华文课程而言难度增大。不过不管是初中阶段还是高中阶段,新加坡学生在修读华文课程时,所读年级等级与所修读华文课程水平并不需要完全对应,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在这些课程中自由选修。这种课程设置方式,应该是考虑新加坡学生来自不同华文程度的家庭背景,为了满足不同母语基础的学生修读。同时,这也为学生根据自己未来学业或职业的规划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不会完全因华文水平而限制他们进一步深造。

表1 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情况

易→难								
易 ↓ 难	初中	中学华文课程					中学华文文学课程	
		华文(基础)	华文B	华文(普通学术)	华文(华文快捷)	华文(高级)	中学华文文学课程	
	高中	H1 华文/华文B 课程					H2/H3 华文文学课程	
		H1 华文		B 华文			H2 华文文学	H3 华文文学

上述方针政策影响了新加坡中学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用。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将新世纪以来“中新”中学教材选用的鲁迅作品进行列表对比(表2)。根据表2,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选择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药》及《藤野先生》

五篇作品。可能是由于学生的实际华文程度相对较低,曾入选中国小学教材的《一件小事》多次出现在新加坡初中课本中。新加坡初中阶段还选用过《孔乙己》和《风筝》这两篇难度相对较大的作品,而在高中阶段,则选择了《藤野先生》和《药》。显然,新

加坡教材所选鲁迅作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很好地体现了因材施教以及循序渐进的教育理念。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也多选用鲁迅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被中国中学语文课本经常选用的鲁迅的杂文、《故事新编》的作品,几乎没有被新加坡教材所采用。这主要是因为鲁迅杂文、《故事新编》等作品对新加坡中学生来说难度太大,而且新加坡的中学华语教学主要是提升语言实用技能与文学鉴赏水平。

通过表2还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中学教材,还是新加坡华文教材,选用鲁迅作品的数量都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中国中学旧版教材选用鲁迅作品15篇,新版降为12篇。新加坡在2012年前,高中阶段选用了2篇鲁

迅作品,而2013年课程标准修改后只选用了1篇。新加坡教材在删减鲁迅作品的同时,增加了除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地区的华文作品的数量。不可否认,中新两国对鲁迅作品选用数量呈现出一些相同点,有世界多元化现实要求等共同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又要透过这种表象看到,就新加坡而言,这种变化也是其教材“从‘追随’到‘自主’”^⑧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新加坡课标对华文作品的本土性以及作品来源的世界多元性的强调^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鲁迅及其作品在新加坡华文教材中一直处于较为稳健的地位^⑩,是所有华文作家中作品选用最多的一位。究其原因,与鲁迅作品的经典性以及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符码”有直接关系。

表2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中学教材选录鲁迅作品情况

	合计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新版					
		初一上 2016年-	初一下 2016年-	初二上 2017年-	初二下 2017年-	初三上 2019年	初三下 2019年
初中	9	《朝花夕拾:消除与经典的隔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回忆鲁迅先生》《阿长与〈山海经〉》	《藤野先生》	《社戏》	《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孔乙己》
	合计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旧版					
		初一上 2001-2015年	初一下 2001-2015年	初二上 2001-2016年	初二 2001-2016年	初三上 2003-2018年	初三下 2003-2018年
	10	《风筝》	《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温馨的回忆与理性的批判》	《藤野先生》《雪》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故乡》	《孔乙己》
高中	合计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新版					
		高一语文 第一册	高一语文 第二册	高二语文 第三册	高二语文 第四册	高三语文	
	3	《纪念刘和珍君》	/	《祝福》	《拿来主义》	/	
	合计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旧版					
5	高一语文 第一册	高一语文 第二册	高二语文 第三册	高二语文 第四册	高三语文		
	《〈呐喊〉自序》	《祝福》 《拿来主义》	《纪念刘和珍君》	《药》	/		
21世纪以来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作品选用情况							

中学	合计	中学华文高级二上 2012-2019 年	中学华文快捷三上 2004 - 2012 年/中学高级华文 2003 年/中学华文普通学术三上 2013 年	中学华文文学课程 标准 2013、2019 年	H1 华文 2006 年	H2 华文与华文文学 2006、2014 年	
	5	《风筝》	《一件小事》	《孔乙己》	《藤野先生》	《药》	

二、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 凸显鲁迅的“现代性”

鲁迅作为承载多重意义的文化符码,在海内外的传播与接受中不断地被阐释。21 世纪以来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去“革命性”,将鲁迅塑造成为爱国主义者、“五四”启蒙者及民族文化精神的承载者等具有“现代性”特点的作家。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情感。”^⑪“革命家”指的是“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⑫。鲁迅在“黑暗如磐”的白色恐怖时期,积极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运动联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身先士卒。毛泽东称他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⑬因此,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不仅是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革命家。

21 世纪以来新加坡华文教材对鲁迅形象的阐释,更多地凸显其“五四”启蒙者与爱国主义者身份。这首先反映于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用。进入 21 世纪,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共选录鲁迅作品 5 篇(见表 2),其中《藤野先生》《孔乙己》《药》是鲁迅对麻木国民的直接批判:《藤野先生》通过讲述“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幻灯片”事件,痛感当时国人的麻木而“弃医从文”,同时述及藤野先生对“我”这类“弱国子民”的同情与关心,让“我”心存感激并对其深切怀念。《孔乙己》对深受封建科举思想毒害的孔乙己寄予同情,也有对麻

木的中国式看客的讽刺与批判。《药》讲述落后麻木的国民,不能理解在辛亥革命中为他们做出牺牲的革命先烈,竟愚昧地以先烈的鲜血治病。这些作品对愚昧麻木的批判,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抨击,是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国主义情感的流露及其启蒙思想观的体现。此外,教材所选用的 5 篇作品,除《风筝》及《藤野先生》分别选自《野草》《朝花夕拾》外,《孔乙己》《一件小事》《药》都出自于《呐喊》集。《呐喊》于 1923 年初版,收录了作者 1918 年至 1922 年所创作的小说。《呐喊》的创作,正是“五四”革命高潮期,鲁迅以启蒙者的姿态,试图打破“铁屋子”,唤醒愚昧的国民的努力。因此,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与辛亥革命失败后陷入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同,也与处于 20 世纪 30 年代白色恐怖笼罩时期愤激的鲁迅相异。此时的鲁迅怀着悲悯热切的愿望,试图通过创作唤醒国人。因此,《呐喊》在批判中多半是带有温度的,与《彷徨》的苦闷与绝望不同,与似“投枪”“匕首”的“杂文”更是不同。鲁迅自己也说过,《呐喊》时期的他“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⑭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鲁迅,更多地是作为启蒙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形象出现。而新加坡的教材对《呐喊》作品的集中选择,显然有助于凸显鲁迅启蒙者形象。

新加坡的教材还通过“作者简介”及作品“主题”等更为直观的方式来阐释鲁迅爱国者与启蒙者的形象。相对于初中华文教材而言,新加坡高中华文文学教材对作者介绍

较为详细,下文特以高中华文文学教材为例进行讨论。2006年版《大学先修班 H2 华文与文学》教材以新加坡教育部2004年课程标准为编写依据,如此介绍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上半叶的杰出思想家之一。”“鲁迅积极指导和鼓励青年与腐败的统治政权作斗争,被视为青年的领袖。”又叙及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运动联盟,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经历^⑮。该版 H1 华文教材的作品“主题”则是这样写的:“赞扬了他正直热情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作者追述了自己弃医学文的思想变化,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⑯课后赏析中又一再强调鲁迅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学医是为了救中国人民,弃医从文也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敬爱他的老师,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⑰。可以看出,教材向读者勾画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如果说,这一版的教材还能窥见作为“革命家”鲁迅的影子,体现了上一个时期新加坡华文中学教材“追随”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观念,那么到了当下所使用的《大学先修班 H2/H3 华文与文学》,则完全抹去了这种痕迹。该教材根据2014年新加坡教育部课程标准编写,其对鲁迅介绍篇幅减少,对他的评价仅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此外,罗列了他的求学及从文经历,并解释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机”以及“立志用文学改变国民精神”。^⑱这些微妙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鲁迅作为“革命家”的特点,更多地显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光辉一页,掀开了中国人民开始觉醒的新篇章。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显然是新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新加坡华文教材突出了鲁迅的启蒙者和爱国者形象,同时也肯定了其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传承者的角色。如在2006年版《H1 华文》教材《藤野

先生》一课的附录中,编者谈到:“鲁迅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与整体素质。”^⑲鲁迅是中国第一位现代白话小说家,“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⑳。因此,分析并了解鲁迅创作技巧及其背后所传递的文化特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并掌握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化。新加坡教育部2019年所发布的《中学华文文学》课程标准指出华文文学的学习,“除了注重培养中学生的文学赏析能力,也着重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加强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㉑因此,课程标准“小说诗歌赏析重点”中对《孔乙己》的学习,强调其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手法和技巧”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的作用。《孔乙己》在满足教学效果要求方面,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对此,台湾方丽娜教授等以“课标”中现当代文学选文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考察了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对选文的意见,在位居前十的选文中,《孔乙己》在“内容和形式具启发性”及“思想意识健康,艺术风格独特”方面位列第二^㉒。由此可以反映出新加坡教学界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离不开作品的语文教学功能。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对鲁迅作为现代作家、“五四”启蒙者及爱国者等形象的建构,凸显了其民族文化精神传承者身份,重视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鲁迅的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新加坡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其建国后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增强民族国家自信及重视启蒙理性等国家观念的折射。这与反殖民战争时期新加坡华文教材强调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是有所不同的,在后殖民时期,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更侧重鲁迅身份的多元性。

对鲁迅的关注重点发生以上变化是有原因的。这之前,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常常采用或参考中国教材体系。如新加坡教育部统编的第一部中华文学教科书《中国文学简

史》(1976年1月出版)便是参考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新加坡教材以中国教育出版社与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教材不可避免会追随中国教材,这也就影响到新加坡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用以及对鲁迅的评判。虽然在1980年至2010年期间,新加坡教育部就华文教学进行了系列改革,但对华文教材带来比较彻底影响的是2004年的教育报告以及2010年的母语检讨委员会所发布的《乐学善用》。尤其是后者,标志着新加坡教材开始真正进入到自主阶段^②。这系列改革也相应地影响到了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与评价。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阐释,经历了从直接受中国大陆关于鲁迅的阐释的影响,到今天的自主,反映出新加坡的国家观念越来越成熟和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主动接纳,因此中国文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以鲁迅为例),显示出更深层次的跨国别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鲁迅形象的“现代性”特点,与新加坡李显龙总理所要求的“能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传统文化,并热爱母语”^④是一致的。这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华人视为保留自己文化之根,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⑤的传统也一脉相承。鲁迅形象的重新阐释,是新加坡强化民族国家观念,加强新加坡公民国家意识的体现。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国策,尤其是对新加坡这样一个上世纪60年代独立的国家而言,种族多元,国土面积小,宗教多样,如何增强新加坡公民的凝聚力,形成自我的国家意识,显得尤为紧迫。对鲁迅的作品去“革命化”,收窄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强化现代性的观念,正是新加坡独立建国国策在华语教学领域中的体现。

三、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强化 鲁迅的“人文关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鲁

迅跨越国界的广为传播,还与作品所内蕴的人文情怀有关。人文情怀本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但它更多地涉及伦理方面,相对独立,所以本文以专节来加以探讨。综观新世纪的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形象的阐释,可以发现,它更进一步注重人文情怀,强化了鲁迅形象的“宽容”“平等”“博爱”的特点。

新版教材的选文标准,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文关怀精神。《风筝》讲述儿童时期作为家中兄长的“我”不允许弟弟玩风筝,待到成年后知道这是一种剥夺儿童天性的行为,试图向弟弟表示歉意以获得内心的安宁,但弟弟似乎已经彻底忘记了,进而强化了“我”的悔恨无法弥补。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最为直观的主题应该是尊重儿童的天性。《一件小事》讲述“我”所乘坐的人力车撞倒了一位老妇人,“我”本想让车夫快点走,可没想到车夫主动扶起老妇人,并带她到警署。由车夫的高大形象讽刺批判作为知识分子“我”的冷漠,传达出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平等。《藤野先生》是作者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同时也可看到超越国界的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精神。《孔乙己》虽更多地表达了对麻木国民性的批判,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我们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对人性恶的批判。作为读书人的孔乙己想教小伙计写字,却被当作笑料,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疯子或者社会底层人想做好人而不可得的悲哀。教材所选录的这几部作品,都倾向于体现具有普适性的人性主题,在批判中富有温情。

除了通过作品的选择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精神,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新版教材通过主题单元的阐释凸显了人性主题。根据中学华文课程标准的“理念”要求,华文教学应“兼顾语言能力的培养与人文素养的提高”,“中学华文课程应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重视情意品德的培养以及对华族文化的认知

与传承,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②6}选录的《风筝》一篇,在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三上中归入到“包容”的主题。“包容”可理解为哥哥应对弟弟想放风筝行为的包容,或者对自己不认同的事物现象有更多包容。“包容”,超越了一切利益关系,以无条件的爱容纳对方,是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风筝》在中国“人教版”教材中被选录在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这一单元主题为“作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写出了亲情的丰富与多样,引起了我们的共鸣。”^{②7}作为这一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教材的学习导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温馨与和美中有亲情,在误解和冲突中也有亲情。”^{②8}这就说明,《风筝》被选入中国语文教材,是以对“亲情”的体悟作为学习主要目标的。这一学习目标,显然与新加坡教材对“宽容”这一主题的推崇不同。其实,这两类主题与作者所意欲表达的对儿童天性扼杀的忏悔无奈显然是有出入的。作为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国家,强调民族之间的和谐,“宽容”的主题显然更符合多民族群居的现实需要。同样,《一件小事》在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的学习中,编著者也有从本民族国家考虑的需求。所归属的单元主题是“人间冷暖”:“在寒风中,在暗夜里,在无助的人生路上,如果有人毫不犹豫地向你伸出援手,你的心里一定会升腾起温暖和希望。本单元的三篇课文讲述了三个感人的故事,人力车夫的真诚关切”^{②9}。这一阅读引导强调相互友爱的精神,这与作者对麻木人性的批判侧重点不同,但显然更符合新加坡今天人与人之间加强交往和交流的需要。

人文关怀精神还通过课后习题或“阅读指引”等形式得以强化。众所周知,课文后的“习题”或相关提问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提问或考察方式在引导学生理解作品过程中可达到不同的效果。上文谈及新加坡华文教材侧重语言的实用功能,而不注重文学鉴赏能力的提升,因

此其课后习题也多以语言交际技能的训练为主。但中学华文教材的每篇课文这些相配套的习题或问题,同样也有引导读者理解作品的功用。以《风筝》为例,新加坡教材后的习题是:“‘我’为什么希望得到弟弟的宽恕?‘我’得到宽恕了吗?为什么?”“‘我’受到了怎样的惩罚?”^{③0}等。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的设置,是对课文“包容”主题的进一步引导和拓展。我们中国的语文教材所选录的《风筝》,课后习题的设置:“‘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是沉重着。表达了作者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精神的虐杀具体指什么”^{③1}等,显然这些问题更有深度,理应与中国学生的汉语水平更高有关。同时,这些更有深度的习题,引导读者对“(家长或兄长)专制”“扼杀人性”等的批判性思考。这样的设问导向,与课文“导读”对“亲情”主题的深入拓展,更易引导中学生认识到鲁迅针对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的批判,倾向于凸显鲁迅爱国主义情感。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新教材课后习题设置与中国的教授不同,与学生汉语水平程度的差异有关,也与教材编撰者的意图有关。新加坡教材更注重从共通的人性关怀的角度来设置问题,引导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而中国教材在肯定作品中人性元素的同时,则更倾向于从社会历史层面引导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综上,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用与阐释,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不可否认,这一现象与新加坡母语教学注重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是一致的。当然,这也与鲁迅作品本身的经典性以及作品主题内涵的丰富性有关。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通过创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性”观的早期提倡者。从作者的《人之历史》及《摩罗诗力说》等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问题为鲁迅思考的重点。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人性”内容,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结语

由于教材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新加坡华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用所显示的特点,为我们窥探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证。新加坡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的阐释,经历了从“革命者”到母国文化的承载者,再到当下兼具“现代性”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中国现代作家等几个阶段,鲁迅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渐趋弱化。从直接接受中国大陆关于鲁迅阐释的影响,到今天越来越趋向客观化,反映出新加坡的国家观念方面越来越成熟和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主动接纳,因此中国文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以鲁迅为例),显示出更深层次的跨国别传播的规律。其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与阐释体现了新加坡的教学理论,特别是其对语文功能的理解影响到了教材对鲁迅作品关注的重点与中国大陆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包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而国家观念、社会治理等现实需要,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透过上述差异,更深刻的还是文化传承上的关联,还有人类在面对共同的生存问题时所具有的心灵上的共通性。

注 释:

- ① 毕世鸿:《列国志·新加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第123-124页。
- ②④ 新加坡教育部:《乐学善用2010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2010年版,第13、11页。
- ③ 陈秋华:《修读华文文学人数下降》,《联合早报》2013年5月25日。见:<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30525-208530>。
- ④ 新加坡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推出的《王鼎昌报告书》(1992)《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1999)《黄庆新报告书》(2004)以及《何品报告书》(2011)等,就是为了调整并应对推行双语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
- ⑤ 新加坡教育部举行“全国杰出华文教师”

颁奖等系列活动,是为了进一步鼓励在华文教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对双语政策的肯定与推进。见:<https://www.moe.gov.sg/news/speeches/speech-by-mr-chee-hong-tat--senior-minister-of-state--ministry-of-education--at-the-distinguished-chinese-language-teachers-award-2019>。

- ⑥ 如在中学升学考试中,以中英文开设有《中国当代史概况》,让更多新加坡人了解当代中国。
- ⑦ 新加坡“Secondary School”(译为“中学”)阶段的学习类似于中国初中,初级学院或大学预科类似于中国的高中阶段,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下文将称前者为初中,后者为高中,两者统称为“中学阶段”。
- ⑧② 李佳:《追随与自主:新加坡华文文学教材嬗变》,《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8年第10卷第2期。
- ⑨ 见2019年新加坡华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理念”(<https://www.moe.gov.sg/>):“文学课程中需要探讨的作品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传统。研读这些文学作品能加深学生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共存的认识。我们希望此文学课程能够使学生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阔的胸襟。”
- ⑩ 对此,王润华在《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一文中也有特别说明,并对鲁迅作品入选情况作了列表式介绍,证实鲁迅一直是新马教材中入选频率最高以及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
- ⑪ 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205页。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2002年版,第424页。
- ⑬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0年版,第44页。
- ⑭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1页。
- ⑮ 南洋初级学院:《大学先修班H2华文与文学现代短篇小说·新诗赏析》,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9-10页。

(下转第88页)

识,只是功利地胡乱简化汉字,结果大大降低了汉字独特的表意和审美功能,破坏了阅读效果,其对于汉字文化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这一切弯路都出于人们没有受到好的人文学科的教育,对于文字语言学没有当代的知识,结果大大破坏了汉字的伟大之处。长此以往,有一天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这一代断送了汉语文化的伟大,淹没了汉字的神奇和智慧,心中将如何地懊恼和痛苦。所以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语文教育一定要深入到古典汉语中,竭力提高国民及青年学者对古典汉语的欣赏审美水平,特别要开汉字课,启发国民及青年学子有当代文字学的理论和审美意识。汉字是我国人民最具智慧的创造,不但是我国的国宝,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奇迹,岂可轻率弃之,或不假思索地接受毁灭性的功利短见的所谓汉字拉丁化的语改方案,公然盲从什么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更文明的谬论。

附记:2006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读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郑敏先生曾对汉语诗歌的语言有深入思考,所以我在文学所刘福春老师的陪同下,到清华大学荷清苑家属院郑敏先生寓所,和郑先生有过几次关于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的交流。我用访谈的形式,提前拟好了要提的问题。郑敏先生当时已86岁高龄,思维敏捷,谈吐清晰,还亲自用电脑把我的问题和她对问题的思考打印了出来,并同意刊发。我2006年9月出站回到开封,将刊发的事放下了。2022年1月3日,惊闻郑敏先生离世,想起了这个采访文稿,十多年前和她交流的场景仿佛还在昨天。感谢《鲁迅研究月刊》给我机会表达对郑敏先生的哀思和纪念。

(作者通讯处: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邮编:475001)

(上接第45页)

- ①⑥⑦⑩ 泛太平洋教育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H1华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0,6页。
- ⑬ 林高,陈志锐:《大学先修班H2/H3华文与文学 现代短篇小说.新诗赏析》,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4页。
- ⑳ 严家炎:《严家炎论小说》,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 ㉑ 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https://www.moe.gov.sg/>。
- ㉒ 参考方丽娜,胡月宝等:《新加坡2013年新版〈中学华文文学〉“现当代小说”之选文探析》,《国立高雄師大學報》2014年第36卷。
- ㉓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 ㉔ 新加坡教育部:《新加坡华文课标标准》2011年版,第3页。
- ㉗㉘ 《七年级语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12页。

- ㉙ 《中学华文课本 三上普通学术》,新加坡名创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 ㉚ 《中学华文课本 二上》,新加坡名创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109页。
- ㉛ 《七年级语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6页。

本文获得2018-2019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19ZDA267)的子课题:鲁迅的“经典化”与百年新文学的“一体化”(1936-197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近代报刊与近代文学的双向互动研究(2016VI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通讯处: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系。邮编:430070;武汉大学文学院。邮编:430072)